什么是中国与中亚“手拉手前进”的动力

■国际锐评

驼铃声声，穿越千年。从过去的丝绸、瓷器，到现在的智能家电、手机，一条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友好交往。随着一场重大峰会的召开，延续千年的丝路古道焕发出新的生机。

5月18日至19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将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举行。这是中国和中亚五国建交31年以来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六国元首相聚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意义非同寻常。

“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这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自1992年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以来，双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全面战略伙伴的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驶入快车道。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这首先得益于元首外交的引领。过去1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次到访中亚，在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古丝绸之路重镇留下足迹。中亚五国元首也到访过北京、上海、青岛等中国多地。2014年，习主席到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家做客。两人手拉手话别时的场景成为佳话。拉赫蒙总统说：“好兄弟就要手拉手前进！”

当前，中国和中亚都处于重要发展阶段。中国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亚国家也着力推进加速发展战略，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与此同时，各国都面临百年变局的冲击，共同克服挑战的愿望更加强烈。在此背景下，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的举行恰逢其时，将推动双方战略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

中亚国家地处内陆，发展是头等大事。中国与它们的经济互补性很强，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给彼此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2022年，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额达702亿美元，比建交时增加了100多倍。途经中亚的中欧班列在中欧班列开行总量中占比近80%。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吉乌公路……一批批基础设施的落地，见证了中国与中亚合作的硕果。

中亚朋友们常说，中亚虽远离海洋，但“我们紧靠中国，中国的超大市场就是我们的大海”。如今，中亚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中亚优质特色商品常常在电商平台上被“秒杀”。哈萨克斯坦的骆驼奶、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车厘子，都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上个月，载有新能源汽车的中欧班列“长安号”从西安出发，开往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与中亚正在加强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中亚不只是“一带一路”的首倡地，更是示范区。

千年友谊，加上实打实的合作，让中国和中亚人民的心贴得更近了。最近，曾在中国学习进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时秀起了“十级中文”，说想念中国的回锅肉、北京烤鸭和担担面。从“汉语热”在中亚持续升温，到中餐馆、中医药走入当地百姓家，再到合作修复文物、开设鲁班工坊，中国和中亚不断推进丝路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与中亚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坚定支持彼此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依托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中国与中亚五国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有力维护了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中亚国际研究所（塔什干）历史文化遗产与人文研究系主任阿里舍尔·萨比罗夫认为，中国–中亚峰会的召开，将进一步深化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各领域合作，共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未来。

“凝聚的力量能将顽石化为熔岩。”这是土库曼斯坦一句著名诗句。过去30多年，中国和中亚国家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如今，六国元首齐聚西安，共谋未来发展，共同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必将创造更加令人期待的下一个“黄金30年”。

试窥泰国“新总理”的政治动向

■廖省：林越

根据泰国选举委员会的数据，5月14日举行的泰国国会下议院选举的99%选票已完成统计，结果前进党（亦称远进党）获得151个席位，为泰党获141席，两党的席位已超过下议院500个总席位的半数。路透社称，列第三的泰自豪党获71席，公民力量党获40席，国家统一党获36席，民主党获25席。还有零散的12席。

《日经亚洲》报道，前进党主席皮塔（Pita Limjaroenrat）表示，已经与为泰党、泰国自由党等4个政党进行沟通，有望建立4党组建的执政联盟，该联盟在下议院占有308个席位。皮塔透露正与另一个小党谈判，以便让执政联盟再多获得1个席位。这期间，他积极笼络多个政党，寻求联合执政，声称已准备好担任“总理”一职。

泰国宪法规定，新届国会成立后，上下两院共750名议员将就总理候选人进行表决，获半数以上支持者当选。但由于上议院250席是军方主导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指派，这意味着反对党必须在下议院拿下376席才有可能赢得总理宝座。

对东盟甚至整个亚洲而言，泰国新政府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此前，泰国陆军总司令纳隆攀誓言，即使大选后出现政治分歧也绝不会有“政变”，泰国“不会再回到军事统治”。若上述承诺能够实现，估计会为泰国带来一番新的气象。

其实，泰国的“选战”早在两个月前就已开锣。首先是已加入国家统一党的现任总理巴育争取连任；其次是泰国前总理塔信的女儿贝东丹·西那瓦，以为泰党提名人高调“宣战”。同时，前进党党魁皮塔加入竞选，成为选举中的第三股力量。泰国约有5228万名选民，预计这次投票率高达85%，成为1946年以来最高指数。

令人纳闷的是，前进党凭啥成为泰国大选的黑马？据了解，前进党的前身是激进的“未来前进党”，由年轻企业家、泰国最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三友集团副总裁塔纳通创办。该党派要求修改泰国宪法、改革王室、取消冒犯君主罪、对泰国进行民主改革，但于2020年被法院解散。塔纳通曾与黄之锋合影，并反对兴建中泰高铁，被很多人归类为“反华政客”。现如今，皮塔作为塔纳通的“继任者”高调卷土重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鲍志鹏表示，前进党的策略是宣布与公民力量党为代表的执政集团“割席”；其次，该党在经济民生领域提出的政见，与为泰党沿用的平民主义纲领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拉走为泰党的选票。根据数据，泰国5200万选民中约有330万的“首投族”，这些年轻人希望泰国有更激进的政治改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保筠认为，泰国这次选举的特点是选民趋向于求变，“适龄且是首次投票的年轻人增加，他们都希望未来能有一个好的前程，特别是远进党本身就是打着为年轻人谋福利的旗号，更擅长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为泰党的支持者是泰国北部贫苦农民，前进党的支持者是城市愤青，其势头已赶超为泰党，成为反对党的核心力量。《曼谷时报》在题为《新一代厌倦了老家伙》的报道中援引政治学者宛维奇（Wanwichit Boonprong）的说法：“年轻人成群结队去投票。他们受够了政治保守主义，他们想要改变。”皮塔正是这种诉求的代言人。而为泰党仍谨慎地绕开“皇室”，不提改革君主制，只谈“民族主义”，令年轻人不满。

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秘书长达努差透露，大选过后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将按照计划加快预算拨付，同时辅助新政府维持财政秩序，解决累积赤字问题，确保泰国经济不会出现技术性衰退问题，为国内外投资者建立信心。

有分析认为，“前进党”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富家子弟构成的“西化左翼革命党”。这类青年政客，往往是好话一箩筐，本事很一般；执政不一定靠谱，但是口号和理念确实很动人。于是，泰国青年选民，真把前进党推上“第一大党”的巅峰。

皮塔长期留学美国，是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双料硕士。如果将来前进党组阁，皮塔成为总理，泰国亲美程度大概率会上升……不过，前进党不是一个反华政党。未来泰国对华关系大概会变成新加坡模式，原则上亲美，实际上经济发展依旧仰赖中国，在敏感地区事务和大国冲突中，保持中立，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

《亚洲周刊》21期封面专题《泰国反对党击败军方 皮塔贝东丹联合执政悬念》评论：“皮塔宣布他将会与贝东丹联手，筹组联合政府。但由于其他小党尚未完全表态，参议院仍然被军方控制，而王室的真正态度如何，军方是否还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仍待观察，皮塔是否可以顺利出任总理，还有很多变数。”道出了其中的曲折。

文章还说：“赢得选举是一回事，组建政府是一回事，取得议会选举最大胜利的政党能否自行产生总理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尽管皮塔、贝东丹各自率领的反对党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前进党目前的六党多数派联盟也仅拥有众议院309票。”

若前进党和皮塔不能获得两院议员至少376张选票的话，执政联盟仍可以像2019年一样，以高票推选“军方代表”出任总理，组成少数派政府。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朱家大院

■朱洪幸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山西省霍州市许村，是朱元璋的子孙明朝皇室后裔居住的村落。

明朝灭亡后，目前所知的皇族后裔少之又少。很多人为了活命，已经改名换姓，远走他乡。而许村的这支朱姓后人，已经繁衍到了第25代。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落地生根，谋生至今，并建造起了当地最豪华大气的朱家大院，这还得从朱元璋的治国安邦之策说起。

朱元璋为了使大明王朝长治久安，使其统治千秋万代，于是将其子孙分封到了全国各地。其中，他的第13子朱桂就被分封到了山西大同，做了代王。代王的第8子朱逊熞又被分封到了霍州。明亡清兴，其后人在这里过起了隐居生活。道光年间，朱家再出善于经商的奇人朱连科。朱连科为朱元璋的第16代孙。他于晋陕豫三省之间通商贾货，并开了几家当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如日中天，成为富甲一方的商界巨擘。于是他选中了许村这块风水宝地，开始营建朱家大院。

朱家大院，位于霍州城北8公里的许村，依山而建，坐西朝东，分为上、中、下三院。其占地面积177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多平方米，大小各式建筑240多间，用时五年方建成，为典型的北方四合大院。

大院的上院亦称主院，是朱家大院建筑群最为精美豪华的部分，是大院的最高层，也是大院最高族群居住和活动的场所。主院结构雄伟，气势磅礴。

其正面坐西向东建有五孔高大宽敞的青砖窑，是为正房；正房的青石台阶下，南北两侧各有房三间。一层四合院，三侧都有前插走廊。正房顶上建有二层楼房，高大明亮，也有前插走廊。其南北两排侧房上又各建一层小巧秀美的木房，别具一格。而南侧则是朱家小姐居住的绣楼，为小姐、丫鬟们活动的区域，非至亲禁入此楼。主院中，线轴分明，南北对称，厦棚走廊，遍布四周，即使下雨月余，也不需穿靴打伞。其东侧则是装饰豪华的宴会厅，高大而明亮，宽敞且气派，入内随处可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大厅的东门上端刻有“山青水秀”四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大字，将宴会厅点缀的无比富丽堂皇。作者出生于“朱家西院”（也称马家院），距大院虽非咫尺，但因有同窗，故也常常到此一游。此不足道。而值得一提的则是，1975年，许村及周边四村五队的妇孺老少，皆来此院参加“许村大队批林批孔现场会”。我们近千人齐聚上院，虽有拥挤，但还是容得千人。

大院的中院，其实就是书院，即朱家大院的学堂。它是一座长方形的四合院，高墙之下，阳光极少，显得院落极深，阴森恐怖。也有人说，这个小院“命”根极硬，阴气十足，无人敢住；还有人说，文房四宝能“镇邪”，于是这里便成了书院。从此，朱家子弟便在此攻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等传统文化。每日朗朗的读书声，驱散了邪气，迎来了祥瑞，增多了几分平安与和谐。

大院的下院，为二进式院落，宽敞平坦，是名副其实的“低端院”。这里与巍峨耸立的上院，形成了巨大反差，极具鲜明对比。这里是长工、车夫、轿夫及所有勤杂人员生活居住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上、中两院服务的，是朱家的后勤管理处。其大轿、小轿、花轿及各式车辆和各类农具，或存库房，或置廊檐之下，或摆放于院中。骡马牲畜，专人饲养；磨坊厨房，管理有序；纺纱编织，监工到位；舂米杵布，无不有司。且下院大门极宽，正对着村中大街，凡运粮调布，出入极为方便。

朱家大院，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古代建筑。其显著特点有五：

一是上中下三院依山而建，拾级而上。假如站在两公里以外的汾河对岸，更能看出其造型恢宏，气势雄伟，宛如汾河西岸，吕梁山下的一座布达拉宫。

二是上院、中院的雕刻绘画，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犹以喜鹊登梅、富贵牡丹、多子石榴、竹报平安、五福登门等作品著称。

三是上中下三院70多个炉灶，共用一个烟道，直通大院之外山巅。它的设计之独特，构思之巧妙，施工之鬼斧，恐无出其右者。

四是上院主房中有地道连接山外。若有外敌进入院内，或是偶遇不测火灾，即可进入地道逃生。不过，真正使用它用于逃生，有无尚不可知。据说“文革”期间，有一队人马想探究竟，入其深不足三丈，即被阵阵呼啸而来的阴风吹灭火把，吓得众人面如土灰，神不守舍，只得无功而返。从此再无问津者。

五是上院的防盗设置，别出心裁。其四合式大院中，南北两侧皆为窑洞，南侧最东端的窑洞，即是上院大门的门洞。假如盗贼潜入院内，将门洞一关，贼人根本就找不见出口。这时一呼家丁，蜂拥而上，窃贼将被束手而擒，这才叫真正的关门捉贼。

目前，朱家大院已有相当的知名度。1989年的电视剧《希望的田野》、1990年的电视剧《千年鼓》、2013年的电视剧《一九四二》等等文艺作品，接踵而至来此大院拍摄了相关场景。

许村的古建筑院落除了朱家大院外，还有朱家东院、朱家西院、范家上院、范家下院、张家大院等等。

关于华人抗争的编年史叙述 (1)

达拉查迪（DARADJADI）

1740–1743年间发生的华人抗争（Geger Pacinan）[1]经常被认为是“华人反抗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事件。事实上，参与反抗行动的不仅只有华人，还有爪哇人。只是因为这一事件始于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大规模屠杀华人，于是“华人”（Cina）一词就成了指这一事件的关键词。由于爪哇人和这场战役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有许多爪哇传统的资料文献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编年史体裁好史料，都有记录了这一事件的经过。

至少在六部编年史（babad）的史料编纂过程中记载了华人抗争，它们分别是：

《华人史》（Babad Pacina）手稿，收藏于梭罗（Surakarta）的芒古尼伽兰图书馆（Perpustakaan Rekso Pustoko Mangkunegaran）；

《华人史》（Babad Patjina），范·多普（Van Dorp）出版社于1874年在三宝垄（Semarang）出版；

《卡尔塔苏拉史》（Babad Kartasura）；

《芒古尼伽罗一世史》（Babad KGPAA Mangkunegara I），又名《亡命史记》（Babad Sambernyawa）

《王宫史》（Babad Kraton）

《爪哇史》（Babad Tanah Jawi）

正如大部分史书惯用的撰写方法，我们不清楚上述这六本史书的作者具体是谁。我们现在所说的“抄袭”在过去的撰写史书的人中也很常见。某一部史书中的某个段落有时会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另一本史书上。举一个例子，《王宫史》（Babad Kraton）中的很多段落都被完整地复制到1874年由范·多普出版社在三宝垄发行的《华人史》一书中。然而，如果对比由范·多普出版的《华人史》和收藏于芒古尼伽兰图书馆（Rekso Pustoko Mengkunegaran）的《华人史》，虽然这两个版本都讲述了情节相同的同一史实，即华人在巴达维亚的甘达利亚地区（Gandaria Batavia）奋起反抗荷兰殖民者直至最终苏南·库宁（Sunan Kuning）在泗水被捕的故事，但却没有发现两版中有内容完全相同的某个段落。而在其他四部史书中，关于华人抗争这一事件也只是记叙了与其他有关史书主要目录列出的一部分内容而已。

华人抗争是一场历史战争，而战争又属于政治行为。因此，除了讲述战争经过，上述的所有史书都穿插了对政治观点、文化交流以及当时社会所发展的精神氛围的叙述。华人抗争发生期间，上述史书对于爪哇族和华族之间关系的叙述，以及其中涉及的主要思想观点，是本篇文章讨论的主要内容。

1740–1743华人抗争 概要

这一事件的发生要追溯到18世纪，当时从中国来的移民难以在巴达维亚定居和谋生。他们被迫缴纳各种沉重的赋税，又或者通过向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行贿以谋求生存。对于不遵守规定的人，东印度公司会把他们逮捕并流放到斯里兰卡（Sri Lanka）。甚至还有传闻说流放途中他们会被扔进海里。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只能奋起反抗。为了先发制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率先发动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杀害了数千名男女。

幸免于难的全体华人都对这次事件感到强烈的不满，他们聚集在甘达利亚糖厂（Pabrik Gula Gandaria），推举郭班让施班让（Khe Panjang/Sepanjang）为领袖。为了继续战斗，施班让的队伍向东转移，于1741年第一季度进入位于中爪哇的马打兰（Mataram）地区。他们联合马打兰国王巴古布沃诺二世（Pakubuwono II），共同夺取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卡尔塔苏拉（Kartasura）的堡垒。之后，他们进攻三宝垄及其周边地区，但最终战败。由于这次战败，巴古布沃诺二世被荷兰东印度公司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反过来对抗华人部队，否则他就要被迫退位。巴古布沃诺二世屈从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命令，倒戈相向。

大部分大臣和马打兰群众仍然坚持抵抗东印度公司，并且推选出新的马打兰国王，名为拉登·玛斯·伽兰迪（Raden Mas Garendi），或者史称阿莽库拉特五世（Amangkurat V），人们通常称他为苏南·库宁（Sunan Kuning）。苏南·库宁的军队联同施班让的军队在1742年6月30日一起攻占了卡尔塔苏拉王宫（Keraton Kartasura）。这时，一位年仅16岁名叫拉登·马斯·赛益（Raden Mas Said）的青年也加入了夺取王宫的战斗中，他就是阿尔雅·芒古尼伽罗（Arya Mangkunegoro）的儿子。然而，苏南·库宁—施班让——赛益联合军队对卡尔塔苏拉王宫的控制只维持大约六个月。1742年年底，原本退守波诺罗果县（Ponorogo）的巴古布沃诺二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马都拉（Madura）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夺回了对王宫的控制权。

施班让和拉登·马斯·赛益共同带领华人军队跟随苏南·库宁离开卡尔塔苏拉地区，向东转移并且继续着抵抗。最终，苏南·库宁在泗水被捕，并被流放到斯里兰卡。拉登·马斯·赛益回到中爪哇继续战斗，而施班让最后于1758年在峇厘现身。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